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佳.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6):45-52.

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孙佳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商丘师范学院 火文化与商文化研究所,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新博物馆学诞生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及世界遗产运动勃兴的文化土壤,带有民主化、多元化、地方化特点。新博物馆学提倡以人为本,服务社区与社会发展,强调对社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关注社区日常生活,保护社区集体记忆和多元文化。这一理念适应了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社区化趋势,以人本性的核心旨归、地方性的叙事视角、活态性的保护方式、开放性的运行机制,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丰富社区参与途径,重建社区集体记忆,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守护社区文化根脉,优化社区文化生态,实现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博物馆学;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可持续发展

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6-0045-08

新博物馆学是全球博物馆界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和巨大变革之后,在外部批判和内省中酝酿出的对传统博物馆学全面反思的一场思潮,是国际博物馆界努力将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向社区、向文化原生地推进的理论和实践成果。^{[1](P10)}新博物馆学扭转了经验博物馆学的“非人性”倾向^{[2](P69)},关注点从物的收藏展示转向以人为中心,基于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诠释这一中心原则,将遗产保护和管理民主化,让社区在保护和传承其遗产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权利。新博物馆学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与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谋而合,都指向了以人为本,关注社区和整体性保护。对空间元素、集体记忆和社区居民、认同与归属的共同关注,成为二者实现耦合的根基所在。

一、新博物馆学的基本理念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新博物馆学是解构传统博物馆学所代表的现代性秩序的一种尝试,其思想体系带有明显的民主化、多元化、地方

化特点。新博物馆学与传统博物馆学在理念与运行方式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博物馆学包含了社区地理范围、生态环境、文化和自然遗产、当地民众、公众记忆、文化特性等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概念,以及强调文化遗产的“原地保护”“整体保护”“自我保护”“动态保护”等理念。如果说传统博物馆学是以物为核心,以经验为基础,以精英为视角,以历史为导向,那么,新博物馆学则是以人为核心,以实践为基础,以大众为视角,以未来为导向,关注点从物的收藏、陈列,转向以人为中心,以地方性视角直面社会问题,直接服务于社区。法国、加拿大、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美国的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活态博物馆,墨西哥的整体博物馆等,均属于新博物馆学实践范畴,本文统称为“新博物馆”。

(一)服务社区居民与社会发展

新博物馆学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理念,表现为以社区居民为本,新博物馆的建设、管理和运行,建立在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保护的高度自觉之上。社区居民既是社区文化的主体和保护者,也是社区发

收稿日期:2021-08-1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中原地区庙会文化空间整体性保护”(2021-ZDJH-28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原地区文化空间类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2021CZX019)

作者简介:孙佳(1987-),女,河南周口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学研究。

展的受益者。正如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 Henri Riviere)所强调的:“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3]于格·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指出,“生态博物馆是居民参与社区发展计划的一种工具。”^[4]

新博物馆学的指导性文件《魁北克宣言》强调,博物馆是“促进社群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民主机制,其基础是社群主义,其关怀的重点是人和社区的需求”^[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博物馆的角色与功能被重新定义,从有形文物的收藏、保护与展示,向教育、娱乐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新博物馆学不仅关注社区的历史,也关注社区中活的文化及其持续发展,以文物保护、文化记录、策展等实践,推进社群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

(二)关注社区生活和集体记忆

作为一种文化建制,新博物馆学实践的目的在于在社区民众的直接参与下,保护、展示和诠释本社区的自然、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使之成为整个社区的“记忆库”。为了达到其目的,新博物馆使用当地的语言、正式的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情景作为其表现方式。因此,新博物馆高度重视社区日常物品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收集、保护与展示,使得博物馆连接过去与现在成为可能。这就要求新博物馆与社区文化相联结,提供对社区民众有帮助的信息,同时作为社区和社会变迁的观测台,记录现代化影响下的地方文化、价值观念与社区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传统是一个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演化中的动态存在,因此,新博物馆在实践中摒弃了在特定时态中展示文化遗产的做法,见证过去,展示现在,展望未来,帮助社区居民将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认为集体记忆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关键,是其对于个人和群体自我认同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享共同记忆,一个群体可以获得深厚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塑造出稳定的集体与社区。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新博物馆学将集体记忆看作核心要素,作为一种记忆场所,不同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到社区记忆的建构、再现、共享、沟通中。对于社区民众来说,新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有机的共同体,是保存和唤醒集体记忆最为重要的场所之一,其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记忆展开的,包括记忆载体的收集,记忆的整合、梳理、叙述、阐释与再现,集体记忆由此得以

创造、延续和再生。对于外来参观者而言,新博物馆的展示对象是具有较强的原真性和异质性的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以社区、村落为单位,展品囊括了从生计模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居住模式到语言、服饰、宗教、艺术的一系列异质文化单元,为参观者营造了一个参与他者日常生活的氛围,通过深度沉浸,对他者世界中诸多文化元素获得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获得震颤、惊异的鲜活体验,并建构出独特的个体记忆。

(三)强调对社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

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新博物馆定义为,“通过科学的、教育的或者文化的方式来管理、研究和开发一个特定社区的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整个传统。”^[6]

整体性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上。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认为,文化与其所在的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为因果。这就要求博物馆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活态性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纳入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对象范围。

整体性另一方面表现在处于文化生态中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上。一个社区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特质不仅在于其规划布局、建筑形式,更在于其内在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底蕴。文化生态环境既关乎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社区的个性与特色。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各文化要素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保护工作中,既要从物质层面着手,也要从哲学、美学、宗教等精神层面分析。同时,整体性还体现为时间上的延续性,不仅包括过去和现在,还要确保文化在未来能够得以传承和延续,这就要求不仅要关注文化诸要素,还要关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体,使新博物馆学真正成为面向未来的科学。

二、文化遗产地保护的社区化趋势

“社区”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不同于现代以个人意志、契约、法律为基础的,缺乏感情交流和人文关怀的“社会”,社区指传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密切、守望相助,成员具有共同归属感和强烈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因此,社区型文化遗产地是从历史上发展而来,保留了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原生社会网络及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具有文化遗产

性质的案例地。在我国,传统村落、古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等,均属此类。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动态保护、适应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热点。

在这种背景下,反思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认同危机成为一种社会诉求,在本土意识与人文精神逐渐觉醒的今天,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保护与传承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行动准则,对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成为重构地方文化认同,促进地方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人们希望通过本土文化的建构来定位自我,建立归属感,并借此改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早期注重遗产本身,对遗产进行简单化的“冻结式”点状保护,后来逐渐演变为注重遗产的未来,对社区文脉及活态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性保护,以推动传统社区振兴与发展,力图在经济变革与遗产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保护对象从物质文化遗产扩展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从建筑物到其周边社会人文环境乃至自然环境,保护模式由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保护,保护主体由政府延伸至社区居民,越来越重视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活跃度和在社区事务中的参与度,以提升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随着国际遗产保护理论日趋成熟,从前常用的带有被动性质的“保护”“保存”“修复”“改造”等概念已逐渐被“适应性再利用”“激活”等带有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法所取代。

我国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也大致经历了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是粗放式、冷宫式的保护模式,近年来是整体性地产开发,旅游化、商业化、“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等模式。遗憾的是,纵观我国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保护与破坏并行,粗放式的“开发性”破坏,公式化、符号化的“保护性”破坏层出不穷,传统社区风貌、氛围逐渐趋同,社区居民世代延续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历史文脉断裂,集体记忆消退,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剥离。不少地方对传统社区的保护与复兴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只注重物质空间的保护,忽略对社区文化属性、社区网络、日常生活的保护,加之民众的保护意识及参与意识落后,导致传统社区“空心化”现象突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原址保护,强调居民参与,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颁发

多个国际文件,呼吁通过重塑社区集体记忆,强化社区的族群认同、伦理价值认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社区的文化遗产、历史文脉、集体记忆、社会网络等成为重要保护对象,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社区参与等理论被运用到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之中。新博物馆学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与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谋而合,都指向了以人为本,关注社区和整体性保护。对空间元素、集体记忆和社区居民、认同与归属的共同关注,成为二者实现耦合的根基所在。

实际上,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不仅面临文物古迹和遗产的保护,更承担着文化再造和社区再造,延续并重构地方记忆的重任。新博物馆学“地域+传统+记忆+居民”的模式,与社区型文化遗产地整体保护、社区参与的取向相适应,因此,在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引入新博物馆学理念,是可行且必要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社区型文化遗产地既具备新博物馆的展示空间,又具备新博物馆的展示内容,构成了新博物馆的核心基础。将新博物馆的基因片段移入传统社区的DNA中,使新博物馆成为传统社区的有机成分。需要注意的是,新博物馆并非只是将博物馆的馆舍、组织等实体因素机械地移植进传统社区,而是将其基本精神与理念、目标与任务、职能与工作方式等移入传统社区,由社区居民自觉、主动地开展新博物馆学实践活动。这种移植并不会改变社区的本质,而是对特定的社区活动进行优化。在新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遗产社区的集体记忆得到传承,文化资源得到发掘,文化特色得以守护,最终实现有效的保护、更新与发展。

三、国际经验及启示

新博物馆学以社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文化遗产的原地原貌和整体性保护的认知,对社区公共记忆的动态保护,对世俗化方法论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民主参与机制等要素的引入^[7],顺应了当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的趋势。法国、日本的生态博物馆,美国的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英国的开放博物馆等均属于新博物馆学实践范畴。虽然基本理念及方法具有共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新博物馆在实践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作为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法国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镇。从1971年第一座生态博

物馆诞生至今,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代更迭,成为世界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代表。法国诺曼底民族艺术博物馆和鲁昂工业遗产博物馆馆长阿兰·茹贝尔(Alain Joubert)将这些生态博物馆分成三类,一是存在于历史街区等城市中心地带的生态博物馆,吸引居民参与管理;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项目相关的生态博物馆,多与旅游项目或文化项目相关,组织居民管理和参加其所举行的文化活动和表演;三是政府和专业组织支持兴建的区域性、科学研究性的生态博物馆,以国家公园为单位,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收集、制作标本等研究工作。^[8]1986年,法国生态博物馆召开第一届全国性学术会议,成立法国生态博物馆理事会,授予26个生态博物馆自治权,并执行“三个委员会制度”,即由当地人选举产生的用户代表委员会,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办者、私人捐赠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以及提供学术和专业帮助的学术委员会。

美洲作为新博物馆学的诞生地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融合社区与地域观念的社区博物馆,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社区居民的推动下建立的。首先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的社区博物馆筹备委员会,通过与专家合作,开设考古、博物馆等相关课程,提升社区居民博物馆专业知识与能力,并通过参观和学习国内外其他博物馆积累经验。成立负责收集管理社区记录的专案小组,从图书馆、各级政府部门及居民家中等渠道收集有关社区的信息,建立社区档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居民对建立社区博物馆的认同,建立社区博物馆内部的管理机制,购置社区应有的基本文化设施。以上工作均通过各种方式的正式与非正式讨论来获得居民的参与和认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出现了大量小型社区独立博物馆,多数由社区居民自发建立,地方政府或信托基金资助,工作人员以社区志愿者为主。这些博物馆植根于社区的“活的历史”,在保护地方景观、建筑、历史文脉的同时,致力于挽救不断消失的能够反映当地传统生活方式的典型物品,如照片、影像、书信、手稿、明信片、口述等,并以可看、可听、可感知的方式加以保存和展现,以此吸引社区居民,并从中产生地方自豪感,为社区带来极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一些社区的博物馆会策划“平民展”(People Show),秉持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理念,利用社区文物举办与社区议题密切相关的展览,由此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同,凝聚社区意识。

北欧国家在地方小型社区遗产保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大部分民间博物馆践行博物馆民主化及地方社区遗产保护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挪威的300余座博物馆中约80%是户外博物馆或社区生活博物馆。20世纪90年代,瑞典斯德哥尔摩历史街区建立“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将博物馆的主要任务和经营范围扩展至整个城市,鼓励博物馆参与到城市的建筑环境和社会生活变迁的讨论中,通过物品收集,观点交流、沟通和辩论来实现博物馆的功能,激发市民对博物馆围墙之外的整个城市乃至世界的好奇心。将博物馆作为探索一座城市和引进新的教育方法的基地,^{[9](P57)}通过灵活的方式,让人们更加了解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逐渐培养对城市的自信心和归属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农林渔业部开始推广“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对传统文化、自然环境与景观进行保护。在收藏与展示的内容上,强调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将新博物馆作为地方小学的辅助机构,鼓励当地儿童参与资料的调查收集、陈列品的制作等,使得新博物馆成为儿童的作业场和研究室。除常设展览之外,博物馆经常开展社区历史人物纪念活动、讲座、特展甚至趣味娱乐活动。在研究工作上,要求以社区实地为基础,深入了解社区的考古历史、物产民俗、发展现状等。在信息社会,个人极易被同质化和象征化,而新博物馆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来帮助人们认识自我。^[10]

欧美国家比较重视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积极与社区内外的学校合作,发挥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让社区居民切实感受到新博物馆对社区发展的积极影响,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及社区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亚洲国家新博物馆实践注重对地方文化的保护,通过对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唤起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尽管各国新博物馆与社区互动的实践经验各有不同,但提炼地域性信息、面向在地居民、处理地域性问题等,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新博物馆共同的使命。

四、本土实践与现实反思

受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影响,中国博物馆界意识到世界博物馆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并开始探寻使博物馆适应现代社会,扩大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优化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服务社会与社区发展的新途径,^[11]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新博物馆的相关

理论随之被介绍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博物馆实践已经完成了三次代际更迭,从西南民族地区到东部地区,从少数民族村寨到城市历史街区,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文化生态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尚未对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进行官方的严格区分,在大部分情况下,二者被视为同一类型新博物馆。实际上,在筹建过程中,我国新博物馆的建设基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城市历史街区筹建的,多命名为社区博物馆;村落地区筹建的,则多命名为生态博物馆。

苏东海先生最早提出在国内建设生态博物馆,并邀请挪威生态博物馆先行者杰斯特龙参与贵州省政府委托的课题组,选择“最脆弱的地区、最脆弱的文化”^[12]加以保护。1997年,在中挪两国政府的主导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诞生。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第一代中国新博物馆具备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13]等关键词,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保护少数民族村寨社区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的模式和工具,提升社区民众的文化特性意识和文化自觉,从而对一些具有重大价值而又面临保护与传承困境的文化遗产展开抢救性保护。第一代中国新博物馆确立了“六枝原则”,强调社区居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明确了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坚持整体性保护,坚持保护优先,致力于促进社区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同时要求外来参观者尊重社区文化,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14](P18)}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的一大特点是不鼓励旅游业,不主动接待游客,因此,在规划与运行中基本不考虑游客需求,既没有服务于游客的设施设备,也没有应对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2003年,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启动,开创了“1+10”的新博物馆模式,以博物馆联盟的模式,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10个生态博物馆共同统筹规划与建设。生态博物馆作为民族博物馆的分馆和基地,由广西民族博物馆提供学术指导和经费支持,并设专人负责工作联络,以强大的学术、政治、经济资源来支持各生态博物馆开展工作,使得生态博物馆理论与所在社区连接起来,也提升了生态博物馆的民族学、人类学价值。作为一个联合体,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各生态博物馆之间的纵向联系较为紧密,进而能够带动各生态博物馆之间的横向联系,在群体体系上相对规范和完善,这是对贵州模式的超越。苏东海先生对此高度评价:“真正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的努力,还是广西生态博物

馆模式。”^{[14](P19)}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新博物馆实践开始延伸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开创了在东部地区建设新博物馆的先河。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定位与其生态立县和统筹城乡、一体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有着密切关系。安吉将生态博物馆与新农村建设共同推进,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提升乡村社区公共服务质量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使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这一阶段,一些已经运行数年的或新成立的新博物馆开始尝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主权。如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在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初,便宣布将管理权移交给村民组成的管委会,政府则退居顾问地位。贵州水族生态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强调村民文化自主权的实现。中国博物馆专业组织逐步开始尝试“减少直接的介入”,进行“间接的、远程的调控”^[15],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得到进一步发挥。随着新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其价值逐渐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和认同,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历史街区文化遗产保护开始引入新博物馆学理念,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黄山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先后于2012年、2013年建成开放。同时,中东部地区一些历史街区的传统博物馆也吸收了新博物馆的理念,具备了新博物馆特色。很多早期新博物馆是在不具备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政府主导、“文化扶贫”“文化代理”色彩。应当看到,过度商业化的包装宣传及外来参观者的猎奇心理会对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人文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伤害。

总体而言,我国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新博物馆已经具备了物质要素和形态,在理念上逐渐向新博物馆学靠拢,并在街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从核心理念到建设管理模式、工作重心、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等,不同程度地背离了新博物馆学的理念。相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和低效性,地方政府往往对旅游产业的高效率、高收益、高政绩更感兴趣,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主导新博物馆发展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将工作重心偏向后者,在新博物馆的实际运营中,文化遗产沦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和工具。

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新博物馆的管理体系大大简化,虽然各地新博物馆规划中的工作原则部分都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具体实践中,上级施

令的生成动力使得社区博物馆的工作和相关活动在本质上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政府和专家往往居于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升级。相形之下,管理的民主性和居民的自主性大大弱化,社区居民的地位从主体转向客体,某种程度上沦为看客,事实上的外来力量成为社区文化的代理人,社区中的居民则沦为名义上的主人。此外,专门立法的缺失和管理制度的混乱,价值系统的变异与动力的缺失,活态文化的缺失等,都导致新博物馆无法在社区型文化遗产地起到应有的作用。

五、策略探讨与前景展望

新博物馆学理念与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结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单纯地将传统博物馆引入社区,也不是简单的露天博物馆,而是要适应社区需要,发动社区群众直接参与社区各方面的文化管理,最终实现文化自治,使文化遗产及其原生环境得到整体保护,并起到联结社区的现实和过去的作用。实现“利用遗产保护来助推社区可持续发展——社区发展促进遗产保护”这一良性循环,才是发展新博物馆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

(一)教育为先,提升社区居民文化自觉

新博物馆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社区居民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源于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自知之明”^[16],社区居民既要熟知社区传统文化的源头,也要明白其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这种“自知之明”建立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成熟的文化空间、丰富的文化资源等基础上,同时,社区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居民的文化自觉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从全世界已有的新博物馆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空间发展成熟、居民文化自觉度较高地区的社区博物馆往往能够起到较好的保护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交流的效果。

文化自觉的提升首先有赖于人们对自身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深刻认识。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社区居民首先要认识自身文化发生与存在的意义,才能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保持特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和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文化自觉不会凭空提升,而是地方社会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提升社区居民文化自觉的

诸种途径中,唯有教育是最为基础、有效且能起到长远效果的措施。这就要求新博物馆制定系统的、长期的教育计划,开展社区传统文化的教育、培训和传承工作。在基础教育阶段,与社区中或临近的中小学合作,加强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技能的渗透式教育,让社区中的孩子们从小培养对自己文化的兴趣和认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可与地方高校合作,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此外,可以面向社区居民和社会公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在长期的、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中,防止文化传承的断裂,为社区居民参与、主导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基础,不断提升其文化传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最终形成社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合力。

(二)还权于民,丰富社区参与途径

新博物馆建设的核心和难点在于社区的认同与参与,必须实现博物馆的基因与社区文化、生活的成功对接,直至渗透到社区日常生活中,从而充分实现其功能。脱离了社区及社区居民的新博物馆是空中楼阁,是无法生存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这一点在我国新博物馆前期实践中已经得到反复证明。同样的,传统社区的魅力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与高生命力,即人文活动的强度^{[17](P71)}。因此,在新博物馆实践中,让公众参与到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保护政策和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才能确保新博物馆理念及其文化性质,实现社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科学性及有效性。

首先,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要在新博物馆方的指导下实现,而保护的有效性则要通过社区居民的广泛、积极参与才能实现。政府、学者应通过观念启蒙,重塑社区民众之于社区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最终达到还权于民的目的。其次,针对社区民众,开展社区传统文化的讨论与培训活动,加深人们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帮助人们掌握一定的遗产保护知识和技能,并逐渐让整个社区居民认识到自己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肩负的责任。再次,在展品的收藏和展示活动中,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增进与参观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建立义工制度,有效运用社区化的人力资源参与展品的收集、展览的设计、场所的布置、导览与讲解,等等,发动社区民众共同整合主题,建置展示环境,使得新博物馆成为社区民众的发声场域,以此突显社区民众关注的和想传达的主题。同时,尽可能多地让社区民众参与新博物馆的日常事务及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活动,在参

与中提升文化自觉,如文物的收集、展览活动,这既能够弥补新博物馆人力资源不足的现实,更能激发社区民众对自己文化的思考和探索,强化文化认同。

(三)重建记忆,守护社区文化根脉

以哈布瓦赫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强调准确的、共识性的集体记忆在社会与群体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只有准确记忆历史,准确把握现在,才能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从而对社区发展做出正确的抉择。社区集体记忆的作用在于保持该社区的连续性和特性,也正是由于集体记忆的存在,社区内物质结构与社会文化才会在内在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得以发展演变,由此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社区的独特风貌与外在形象。在新博物馆学理论中,集体记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一座新博物馆能否生存下去,并且在社区的文化维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所在社区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并在集体记忆的维护与重建中起到作用。正如于格·戴瓦兰所强调的,新博物馆应该是构建社会共同记忆的文化空间,而非居高临下地向参观者展示宏大历史或其他主题的场所。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机制并非单纯依赖展品,更取决于展品选择、展陈设计、引导路线、图片说明、历史叙述等,如何选择展品并将其按照一定的叙事逻辑进行有效排序,是博物馆通过叙事建构集体记忆的基本途径。

在新博物馆学的叙事话语体系内,集体记忆的构建是通过微观历史和社区个体的表达来实现的,为民间历史与文化争取了表达空间,将社区居民推上叙述的舞台,由他们亲自讲述、表达自己的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由此唤醒集体记忆。台湾学者王明珂指出,“个人与社会都常借着具形的或可见的物件或文字、图案以唤起记忆,参观博物馆,读一本历史书,翻看家庭照片,都可以当作是唤起或更新集体记忆的活动。”^[18]因此,在新博物馆的日常展中,应当注重对与社区居民生活记忆密切相关的资料、物品和事件的收集与再现,唤起参观者关于个体及群体的记忆,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进而建构起社区文化认同。

(四)整体保护,优化社区文化生态

社区型文化遗产地本身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有机体,社区中的建筑、文脉、历史、文化、邻里关系等都应被当作一种生命形式、生命体系来对待,根据其生命历史和生存状态来维护、保持、发展和更新。新博物馆学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

性,^[19]在这一理念指导下,通过新博物馆工程的实施,对社区文化遗产进行活态性、整体性保护,可以有效改善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优化社区文化生态。

新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并以合适的形式加以展示或利用。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对于建筑、公共空间等不可移动的文物进行详细的勘察记录并建档备案,确保所有传统建筑都纳入保护范围。同时,从文物保护专业层面对社区中传统建筑的修缮加以指导,严格遵守文物修复中的“修旧如旧”原则,尽量按照原有工艺、材料和程序完成修缮。对于仍在使用的民居的修缮,新博物馆应当加强宣传,引导社区居民尽量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改善住宿条件。同时,要延续街区历史上的生活空间,充分利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服务设施,并继续发挥其原有功能,如街区中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医院、治安机构、宗教场所,等等。对于日常生活中具有文物价值的器具,新博物馆可以引导居民妥善保护或取代,将其被破坏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得以产生的自然与文化生态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要求在对遗产本身及其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必须将其放在原生环境中加以整体性、活态性保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来展开保护。横向保护指的是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结合,维系社区内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对社区内的自然环境、集体记忆、日常生活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因素进行整体性保护。在纵向层面,要求新博物馆将社区中的文化遗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摒弃唯古、唯传统的遗产保护理念,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的生存状况。

新博物馆理念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包括对遗产主体——传承人及社区居民的保护,对遗产原生环境——社区环境的保护以及对遗产内容和形式的整体性保护,忽视其中任何一环,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地都将沦为空谈。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过去导向”,新博物馆学的一大特征是“现在或未来导向”,秉持一种积极的发展面向。博物馆作为联系社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创造社区的未来,从社区的现实和未来看待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视文化遗产在当下的生存状况,让社区居民看到文化遗产的未来,并将其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相结合,从而赋予文化遗产以强大的生命力,并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新博物馆学从诞生至今经过了 50 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尚未形成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理论范式,但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如以人为中心的理念,积极参与社区振兴与发展,已成为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新博物馆学兴起起到鼎盛再到裂变,不过短短数十年历史,我国的新博物馆实践也不过二十余年,新博物馆是否能成为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理想模式,目前还难以定论,但起码提供了值得探索的方向。通过社区参与、重建集体记忆、整体保护、完善制度等路径,最终实现还权于民,优化社区文化生态,实现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当下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社区型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苏东海.博物馆沉思录(卷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2]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3](法)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J].中国博物馆,1995(2).
- [4](法)于格·戴瓦兰.“生态博物馆”一词及其它[J].中国博物馆,1986(4).

- [5]魁北克宣言[J].于鸣放,译.中国博物馆,1995(2).
- [6]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J].中国博物馆,2001(2).
- [7]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J].中国博物馆,2011(Z1).
- [8](法)阿兰·茹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J].张晋平,译.中国博物馆,2005(3).
- [9](瑞典)海伦娜·弗里曼.没有围墙的博物馆[A].国际博物馆(中文版第2辑)[C].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
- [10](日)大原一兴.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J].张伟明,译.中国博物馆,2005(3).
- [11]孙葆芬.密切注意国际博物馆学界的新动态[J].中国博物馆,1986(3).
- [12]倪威亮.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反思与瞻望——苏东海先生访谈[J].中国博物馆,2011(Z1).
- [13]安来顺.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J].中国博物馆,1995(2).
- [14]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15](意)毛里奇奥·马吉.世界生态博物馆共同面临的问题及怎样面对它们[J].张晋平,译.中国博物馆,2005(3).
- [16]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
- [17]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 [18]王明珂.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J].当代,1993(91).
- [19]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2013(5).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Under the Concept of New Museology

Sun 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Henan; Institute of Fire Culture and Shang Culture,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Henan)

Abstract: Born out of the cultural soil of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ld heritage movement, new muse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democratization, pluralism and localization. It advocat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commun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holistic con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community, the concern for the daily lif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ommunity and diverse cultures. This concept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With a humanistic core objective, a loc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a living conservation approach and an open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museums can play an educational role, enrich the mea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rebuil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ommunity,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safeguar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mmunity, optimize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communi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new museology;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